

森林生态旅游缘何走偏?

规划建设不合理,偏离生态旅游标准

◆本报记者刘晓星

以森林公园为主要依托的森林生态旅游已进入大众化旅游的新阶段。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建立各级生态旅游地3000个,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0%。

森林生态旅游利用原本具有一定旅游价值的森林资源,进行有控制的开放。但是近年来,受市场需求拉动和商业利益驱动,过大的旅游规模与过快的发展速度加剧了环境损耗。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以满足人们“回归大自然”需求的森林生态旅游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应该如何科学理解森林生态旅游?森林公园如何解决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问题?森林公园如何按照环境容量承载力进行公园分区?需要制定哪些相应的标准?就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旅游开发势头强劲
□生态环境遭受威胁

我国生态旅游从20世纪80年代起得到了长足发展。数据显示,以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林场、风景名胜等为主要场所的森林旅游维持着大约每年15%的增长速度,游客接待人数接近8亿人(次)/年。

一方面,我国森林生态旅游开发势头强劲,但另一方面,旅游地生态环境遭受着严重威胁。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旅游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乌恩认为,在森林地区搞旅游一定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在旅游开发中要考虑、研究甚至计算开发对自然生态的影响程度,并判断这一改变是否可以接受,这是一种务实、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森林生态旅游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影响。“因游客活动区域不受限制,旅游公路建设和旅馆、游线设置不合理,会造成动物生境破碎、生境面积减少,动物活动范围缩小,从而使动物的习性发生改变,迁移、繁殖能力下降。”乌恩说。

比如,由于旅游者的干扰迫使三角山羊退缩到气候恶劣的高海拔地分,结果导致80%的小羊患上肺炎,种群逐渐衰落。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森林茂密、草碧牛壮,令慕名而来的海内外游客惊叹不已。 蒋朝晖摄

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对森林旅游资源认识不足,采用掠夺式的发展模式和粗放的管理模式,黄金周游客往往超过环境容量,“森林生态旅游”愿景演变成“破坏森林生态”的状况。

■存在生态旅游误区
□缺乏科学空间管理

在乌恩看来,从管理机构到规划师对生态旅游的观念、模式缺乏科学认识,更缺乏将生态旅游观念、模式落地的能力和经验,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同时,还有一种认识误区是将生态旅游模式与商业上的成功对立起来。其实,只有错误理解生态旅游与商业间依存关系的经营行为,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

2013年张家界、庐山、五大连池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牌警告时提及的整改方向“向公众科普地球科学知识”,就是“环境解说”、“自然教育”的一个方面。这次警告倒不是说这几处风景区的开发破坏了生态环境,而是说他们的开发方向偏离了生态旅游的原则、价值观和标准。

业内专家表示,规划建设不合理是造成我国森林生态旅游地生态环境遭受破坏、面临威胁的首要因素。正如乌

恩所言:“从操作层面上看,环境破坏的首要原因是生态旅游地缺乏严格、科学的空间管理。”

到底是什么是森林生态旅游?乌恩认为,森林、湿地只能开展适度的旅游利用,要严格、科学地进行空间管理。尤其是对旅游设施进行科学布局,只能拿出森林和湿地的少量空间,用来安排设施和供游客涉足游览,大量空间须保持原野景观,不破坏生态系统完整性,不破坏生物和鸟类的栖息环境。

■形成环境友好共识
□严控环境承载限度

当前,森林生态旅游发展正处于初期阶段,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学界做出很多努力。

如何用法律来平衡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乌恩说:“立法机关和政府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生态旅游开发活动。”日本在1931年就颁布了《国立公园法》,在2007年颁布施行了《生态旅游推进法》,而且在这些法律的立法阶段都有专业人员参与其中,通过法律来平衡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从普通游客、管理人员到规划设计人员,能够科学理解和认识森林生态旅

游这一概念,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应该加强宣教,帮助社会各界建立生态旅游意识。”乌恩说。

比如日本在颁布施行了《生态旅游推进法》之后,通过印刷出版物、发布解说漫画、推行“国民接触自然行动计划”等进行了广泛有效的宣教。

科学进行空间管理从而在环境承载限度内发展旅游,是生态旅游的首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国外学者提出了“游憩机会序列法”。打个简单的比喻,一座山,应该让穿皮鞋、登山鞋的游客都有各自喜欢的空间,既要有设施密集的大门口,又要有安置解说牌的游步道,还要有连垃圾箱都不能出现的荒野地域。

“游憩机会序列法”是处理一座山上“不同类型空间”与“不同类型旅游体验”间关系的方法,通过保持、强化“不同类型空间”的存在,在满足游客“不同类型旅游体验”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自然多样性。

乌恩认为,在操作层面上,可以建设一些高水平的生态旅游示范地,采用最先进的理念和模式,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力争做出一批全国示范样本,让地方政府、森林公园管理机构、投资商、国民看到真正的生态旅游到底是什么样的。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地质遗迹和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本身数量较少,因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虽大,但是面临的压力也较大。国家有关部门在审批涉及这类保护区的生态旅游项目时应该更加慎重,加强监管。

同时,由于旅游收入有效转化为保护成本的机制缺失,导致保护区不仅无法从旅游活动中受益,还要为减轻大规模旅游活动带来的环境影响而投入更大的保护成本,完全背离了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的初衷。

■中国环境报:为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在体制、机制方面应如何完善?

秦卫华:有关部门应强化生态旅游的宏观管理,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制定全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战略。正确认识生态旅游,制定与地方各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相协调的生态旅游总体规划并报批,使之与保护区总体规划协调一致。制定相应政策,将保护区管理机构的保护职能与经营职能相分离,建立旅游收入的反哺机制,确保部分旅游收入能有效返还保护区,并用于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的开展。

加强监测,量化生态旅游带来的环境影响和保护区生态旅游的承载力,为保护区生态旅游管理提供依据。应尽快开展保护区生态旅游专项研究,厘清不同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的交叉重叠情况,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若从宏观来看,同为长江生物链顶端的大型肉食性水生生物——中华鲟、白鲟、白鱈豚、江豚等全部陷入濒危和灭绝的境地,其反映的是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整体恶化所造成的水生生物资源危机。

在李志远看来,长江生态系统、周边的人类活动都会影响鱼类的生存环境,比如船舶的螺旋桨噪声,就会破坏中华鲟的声纳系统。我们可以为陆生动物圈出一个保护区,却没能在长江中为鱼类划定生存场所,长江只有一条,它们生存场所也只有一个。1982年开始,中华鲟实现人工科学繁殖以后,可以对野生种群资源形成补充。这次在放流中华鲟的同时,也在沿江地区启动了保护中华鲟的志愿者活动,希望能由水生生物保护进一步推动长江水生态的保护。

湖北试点农机深松整地补助

每亩补助40元,今年将惠及150万亩耕地

本报讯 湖北省农机深松整体作业现场推进会在天门市举行。湖北省将在天门、枣阳、京山、黄梅等32个县(市、区),开展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助试点,补助标准为每亩40元,今年将惠及150万亩耕地。

开展农机深松整地作业,目的是为农田“舒筋活络”,通过拖拉机牵引深松作业机械,在不打乱原有土层结构的情况下,打破犁底层,改善耕层结构,解决耕地土壤板结、耕层变浅、保水保肥能力差等问题,促进农作物增产,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据监测,表土耕层每加深1厘米,就可多存储3毫米降雨。深松深度达到30厘米,每公顷地块可多蓄水400立方米左右。耕地经过一次

深松后,当季可增产10%,效果将持续2-3年。

今年起,湖北省将连续3年安排财政资金,用于补助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计划到2018年完成460万亩深松任务。湖北省农机局局长刘长华介绍,补助资金将直接下发给农机合作社,既调动机手的积极性,又减轻农民负担。

同时,为保证深松整地效果,湖北省要求所有实施深松作业的机具必须安装北斗深松作业监测终端,并已安排农机购置补贴优先保障相关机具以及配套终端。届时,技术人员可随时监控农机作业轨迹,统计作业面积以及核查质量。

汪彤 陈鹏宇 秦建巍

福鼎柘子产业实现绿色发展

延伸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王亚京福鼎报道 国家级生态乡镇——福建省福鼎市贯岭镇柘子花近日如期而至。当地农民积极采收白色柘子花,享受丰收的喜悦。

每年五六月,贯岭镇的万亩柘子园便会盛开洁白的柘子花。福鼎市是国内柘子种植面积和柘子果产量最大的原料林基地,现全市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其中50%在贯岭镇。2015年全市鲜柘子果产量1.8万多吨,占国内药用柘子的50%。近年来,贯岭镇始终围绕生态种植,打造“地标”认证,依托品牌建设,稳定并拓展销路,致力延伸产业链,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促进一方经济发展。

目前,福鼎市大量推广种植的黄柘子优良品种。黄柘子是灌木树种,四季常绿,抗风、耐旱、耐瘠薄。通常在山顶、陡坡、干旱瘠薄、风口等生态环境特别恶劣的区位,其他树种无法正常生长,而黄柘子不仅能迅速绿化荒山,并且对恶劣气候的适应性也强。同时,黄柘子种植容易、管理粗放,特别适合边远贫困山

区农户种植,还是一个精准扶贫的一个好项目。

在福建省福鼎市的大力支持下,福建恒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系列产品的综合开发,变废为宝,既节约生产成本,提高农户的经济收入,而且有利于黄柘子产业的绿色循环发展。

如在中国林科院林化所的指导下开展的柘子果综合利用项目,项目主要工作流程是先压榨(萃取)柘子油,然后将脱脂后的“柘子饼粕”提取分离柘子黄色素、柘子苷等活性物质,再将“渣”加工生产有机肥或生物饲料添加剂;柘子果渣生产的有机肥含黄柘子生长发育所需的微量元素和有机质,回施到林地可以补充因大量结果损失的土壤微量元素,改善林地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福建省福鼎市贯岭镇还积极推进以柘子文化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将特色民俗文化元素植入,从而使国家级生态乡镇——福建省福鼎市贯岭镇在生态种植、生态文化及柘子产业等方面得到更全面的提升和发展。

建立考核制度,调动社会参与

冠县多措并举打造生态新亮点

本报讯 山东省冠县今年紧紧围绕“争创全国绿化模范县”的战略目标,以提升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为宗旨,以建设生态文明为主题,初步形成了有道路就有绿荫、有河渠就有绿屏、有村庄就有绿景、有空地就有绿色的良好生态景观。

科学规划,拓展绿色空间。今春造林绿化按照国家绿化模范县的要求,聘请省林业专家高起点、高标准地编制《冠县总体绿化方案》,本着适地适树的原则,科学编制造林规划,形成了以乔木树种为主体,以农田防护林和绿道为基本框架,多树种、多树种、乔灌花草立体种植结构相结合的城乡一体化生态大格局。

狠抓质量,确保造林成果。坚持把提高林木成活率和保存率作为造林绿化质量的根本要求,林业部门成立技术督导组深入乡镇(街道)生产一线,认真把握整地、挖坑、栽植等关键环节,做到“三埋两踩一提苗”。健全完善管护机制,对护林员明确职

责,建立考核制度,同时加大对盗伐、滥伐树木的打击力度,切实巩固造林成果。

创新机制,增加绿化投入。冠县高速公路东段土地流转、绿化及6条国道土地流转资金实行全县统筹,把资源转化为资产,增加绿色发展投入,积极探索“全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社会化造林”的路子,调动社会各界参与造林绿化的积极性,有效提高树木成活率、保存率,解决了“年年栽树年年荒、年年栽在老地方”的问题。

明晰产权,及时确权发证。今春造林绿化灵活运用多种机制,进一步明晰产权,在公开、公正、公平、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对路、沟、渠、街道等植树地点,适合实行竞价拍卖,将绿化权拍卖给群众,走社会化营林的路子;所栽树木都明晰产权、责任到人;栽植后,不动产登记部门及时进行确权发证,不栽无主树,不造无主林,切实提高造林积极性。

成连宾



成群结队的蓝喉蜂虎鸟近日在大别山区安徽省霍山县一处树林和草地间飞舞觅食。据鸟类专家考察,霍山县这一带有200多只蓝喉蜂虎鸟繁衍栖息,成为已知的中国最大的蓝喉蜂虎鸟繁殖地。当地政府决定斥资在此营造一处鸟岛,蓝喉蜂虎鸟等珍稀鸟类将有长久的栖息家园。

中国日报图片网供图

别让旅游踩碎了保护的初衷

——访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自然保护区研究中心副主任秦卫华

◆本报记者刘晓星

中国环境报:请问现在各地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的情况如何?

秦卫华:目前,我国已有54.2%的国家级和50.4%的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生态旅游活动,旅游规模和范围仍在逐年扩大,这些活动尽管以生态旅游的名义展开,但绝大多数仍属于一般旅游范畴。

大多数自然保护区缺乏生态旅游的科学规划和规范管理,以及开展常规旅游的运营管理措施,对自然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为此,急需查明当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客观发展现状,找出其存在问题并进行科学分析,按照生态旅游的规范标准提出有效的建议和对策,为国家制定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的政策与法规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环境报: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存在哪些潜在威胁?

秦卫华:自然保护区往往是我国重要生态系统和主要保护物种的分布中心。正由于这种生态重要性,风景名胜等其它类型的限制开发区域在同一地区相继建立,导致同一片地理区域多种保护区重叠现象时有发生。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例如,云南省三江并流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南延部分,三江并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各种保护区中面积最大,约占这一区域总面积的83%,它基本囊括了区域内碧塔海、哈巴雪山自然保护区等9个国家级、省级和县级自然保护区,并且包括了梅里雪山等10个风景区,其中碧塔海保护区生态旅游接待人数每年超过100万人(次)。

这显然与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展中小规模、低容量、以保护为前提和

限制性开发等原则不符,并且风景名胜区等各类区域实际上都以开展旅游活动为由甚至辐射到周边地区,在生态旅游规模和综合产值上要远远超过自然保护区。

中国环境报:由于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等交叉重叠导致生态旅游活动过量扩容,这对生态有哪些影响?

秦卫华:一方面,各行政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与保护区管理机构间、各管理机构间矛盾冲突不断,责任推诿,利益互抢,却忽视了保护区的建设,违背了保护区建立的初衷。

另一方面,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居民间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利益分配的矛盾、社区压力增大衍生的矛盾愈演愈烈,使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居民隔离。当地居民产生对产权不清或缺乏监管的自然资源滥用,以满足自身利益,最终使保护区成为“孤岛”。

长江沿线启动保护中华鲟活动

首次利用卫星标记掌握洄游规律

本报见习记者李苑南京报道 江苏省南京大学环境协会与三峡集团近日携手举办了“鲟梦金陵”爱江护鲟活动。旨在通过主题环境教育等系列活动,推动包括中华鲟在内的长江水生生物保护。本次中华鲟放流活动,不仅可补充濒危物种资源,还首次引入卫星标记,帮助获取更多科研数据,深化长江水生生物和水生生态研究。

据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副所长李志远介绍,此前在湖北宜昌放流2020尾中华鲟,包含了2009年和2011-2014

年5年繁殖的鱼种,放流鱼种遗传多样性显著,平均体长和体重也创造了新纪录。本次放流还首次在6尾中华鲟体表悬挂了卫星标记,标记利用自动熔断技术,分别在放流后70天、90天、120天和150天后自动脱落浮出水面,链接卫星并发送洄游路径水温、盐度及轨迹信息。科研人员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获取中华鲟海洋生活环境及近海活动方位,掌握中华鲟放流群体在长江的洄游运动规律和海洋生活史,研究洄游鱼类习性与环境的相关性。由于一枚卫星标

记的总投入约为6万元,因此暂没有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基础。

作为长江的旗舰物种,中华鲟的存续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长江的水生态环境。

“不能单靠物种保护来谈中华鲟及长江生态。”参与这次放流活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鱼类生物学家曹文宣认为,人类各项活动中,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社会关注度较高,人们往往倾向于从这点上找原因和解释。事实上,尽管大坝对于中华鲟洄游会产生一定影响,但